

经济体制改革 和股份制实践

范永进 朱瑶翠 曹俊·主编

*Jingjitizhigaige
he Gufenzhi Shijian*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经济体制改革 和股份制实践

范永进 朱瑶翠 曹俊·主编

郑俊镗 郑伟刚·副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经济体制改革和股份制实践 / 范永进, 朱瑶翠, 曹俊
主编. --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1
ISBN 978-7-80745-942-2

I. ①经… II. ①范… ②朱… ③曹… III. ①中国经
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②中国经济—股份制经济—研究
IV. ①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03817号

经济体制改革和股份制实践

主 编: 范永进 朱瑶翠 曹 俊

副 主 编: 郑俊镗 郑伟刚

责任编辑: 杨 国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毫米 1/16开

印 张: 37.625

插 页: 8

字 数: 632千字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745-942-2/F·180

定价: 9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今天 改革开放 30 年

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大会上午举行
中央三台和主要新闻网站现场直播大会盛况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会上的讲话。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12月17日电 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将于12月18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中央电视台第一套、第四套、第九套、西班牙语频道、法语频道、新闻频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英语，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将现场直播大会盛况。

2008年12月18日，《解放日报》登载的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盛况的文章。
图为邓小平在全会上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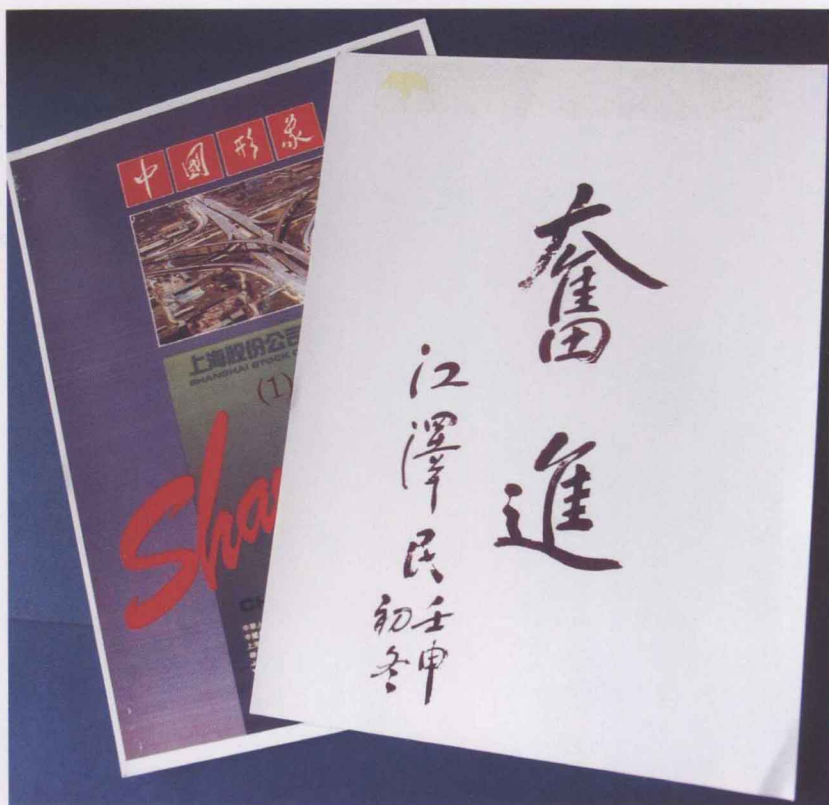
1987年9月17日，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在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秦其斌陪同下参观公司音盆车间和自动装配流水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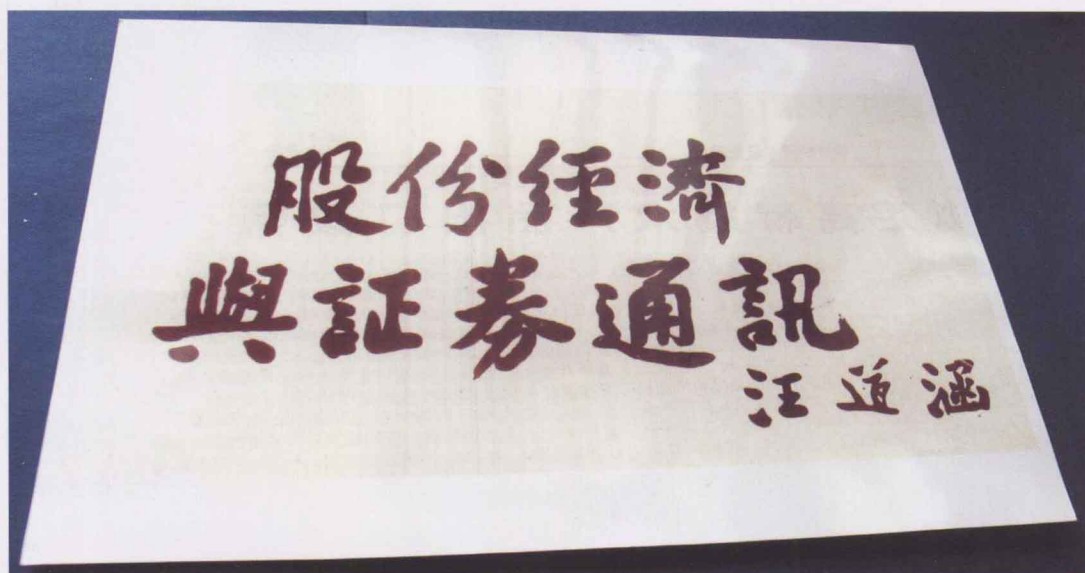
1985年8月，时任上海市副书记的吴邦国等领导到上海飞乐音响股份公司考察



1985年8月，吴邦国、黄菊、高文魁和李祥瑞、贺镐圣、鲍友德、叶龙蜚、毛应樑、张济、徐家澍、戴培敏、秦其斌（前排右三）等在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调研会上的合影



1996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为《中国形象——上海股份公司专辑》题词



汪道涵为上海股份制与证券研究会会刊《股份经济与证券通讯》题写的刊名



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上海股份制与证券研究会原会长 厉无畏



原上海宝钢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上海股份制与证券研究会副会长 谢企华



著名经济学家、著名市场经济学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1995年3月，经济学家戴园晨就股市发表讲话

他说：购买股票的收入是正当合理的收入，任何人都
有权利购买股票，任何不允许购买股票的规定都应重新讨论。

者：发行普通债权是目前国家建设的主要手段。但是，已有一些企业通过发行建设债券募集资金，忽认为国债和发行一种用于国家和企业建设筹资券。

答：以：债券是国家的信用凭证，特点是利息并不得个人购买和转让，风险由于可以承担，特点是可以得到，股票的经济效益和风险，债券有期限资本，而股票是不还本利偿还，因此，有期限的资本，所以，股票是企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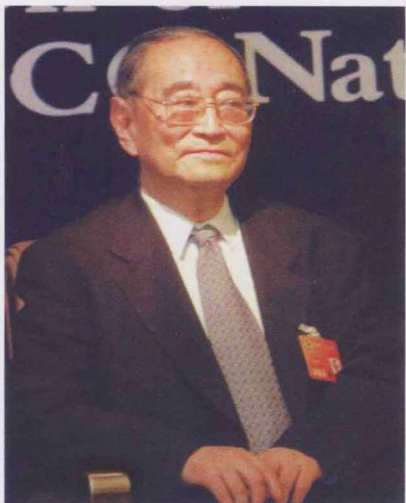
由于债券容易贴现，而股票只能低押抵押，因此，股票在初期时价格会增长，增加和各方方便更有还重要的意义，价格是自由和需求和两个地方决定，而，而这个问题不是能压断资本就能解决的，而是这个人的购买欲望是增加和保持，保持价格本稳定的前提下，个人购买股票后，对这部分收益收入

一种投资收益，它比按接近于储蓄存款。既然是在私营制中可以，那么，间接投资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在利润分配的形式不仅仅是按劳分配一种形式，还有按资分配形式，其中就包括购买股票投资的收入。从从票的收入是正当合理的收入，任何人都有权利购买

其次,我们认为除了发行股票和债券之外,承包企业,可以采取建立企业风险基金的方式筹资。这种企业职工自愿参加,如果工厂盈利,职工可以领取股份,取得一定的权利。如果企业不赚钱,那么,这笔钱就作为企业周转时期的抵押,和企业的所有权分离了,它和利息,而是和企业经济效益挂钩的。就这点来讲,股票,但它又不能象股票那么复杂。它毕竟不是企业所有,不能领取股息,也不涉及大局,它只是承包企业的风险基金。因此,可以性较大,易于操作。而且能使企业盈利时,承包者和职工在收入分配上,公平一点。职工领取风险基金,矛盾会缓解。同时由于企业职工的利益相联系,可大大增加承包和租赁企业的凝聚力。如果租赁和承包企业一旦亏损,由于有了风险基金的日子就不会太难过。现在看来,这种企业风险

A color portrait photograph of a middle-aged man with dark hair, wearing a dark suit jacket, a white shirt, and a dark tie. He i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left of the camera. The background is a plain, light-colored wall.

1992年10月26日，国务院任命刘鸿儒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任主席



著名经济学家、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全国政协常委 厉以宁

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非升即走的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我国试行股份制取得阶段性成果又有何意义

[illegible]

1



一、有优越性



1992年6月23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的篇幅发表刘鸿儒的文章《关于我国试行股份制的几个问题》

邓小平送出的一张中国股票

■本报记者 潘清



1986年11月14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向邓小平赠送纽约证券交易所证券。当天,邓小平将一张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回赠给客人。

新华社发
(资料照片)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会见了以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为团长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代表团。在接见客人赠送给他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券和证券样后,将一张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回赠给客人。

国际社会因此发出了“中国与股市握手”的惊呼。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用这样一个举动向世界宣布:股票市场并非资本主义所专有,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利用这一有效工具发展自己的经济。

曾任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的刘鸿

儒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年范尔霖赠送给邓小平的精美证券,凭着它可以在华尔街股票市场中通行无阻;邓小平回赠的则是新中国首批公开发行的股票之一的“小飞乐”股票。

范尔霖获得“中国的第一张股票”后非常兴奋,并亲自到中国工商银行投资咨询公司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办理了过户手续。

实际上,那时候的中国股市还处在起步的状态。在上海开设的第一个股票营业柜台上,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是仅有的两只交易股票。没有电脑,没有行情显示屏,成交价由客户口头协商,然后写在黑板上。交割、登记卡号、盖章、过户,所有的程序都是手工完成,每天的平均交易量只有数十笔。

人们用一种复杂甚至是怀疑的眼光审视着刚刚出现的这一新生事物。中国究竟能不能搞股份制?能不能发展资本市场?会不会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分歧始终伴随着股市的“婴儿时代”。

邓小平的这一举动无疑给了正在蹒跚学步的中国股市以莫大的肯定和鼓励。在此后的十多年中,这位伟人始终关注着资本市场的发展。

很多证券界资深人士至今对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时发表的那段讲话记忆犹新。“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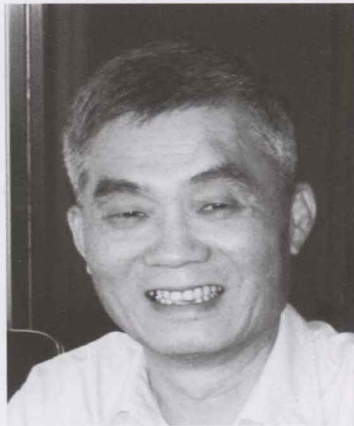
这一精辟深刻的谈话和“不争论”的观点,成为股票市诞生初期的思想理论基础。就在那一年的10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证券市场由地区性试点进入全国范围推广。

邓小平送给范尔霖的股票早已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珍贵收藏。但它背后的故事,却成为新中国证券史上最值得书写的一段历史。(新华社上海8月20日电)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凡尔霖先生。图为《经济参考报》2004年8月21日登载的特稿《邓小平送出的一张中国股票》



1984年11月18日,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公开发行股票,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首张公开发行的股票,被誉为“新中国第一股”,人称“小飞乐”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秦其斌



1986年11月16日，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凡尔霖手持飞乐音响公司股票到静安证券业务部办理过户手续。左起为时任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部经理黄贵显。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李祥瑞

1984年：

小飞乐带出1亿中国股民

■ 吴纘超

见证时刻：1984年11月18日

见证人物：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秦其斌 时任飞乐音响副总经理蔡用遵

见证地点：上海市武夷路174号
上海飞乐电声总厂门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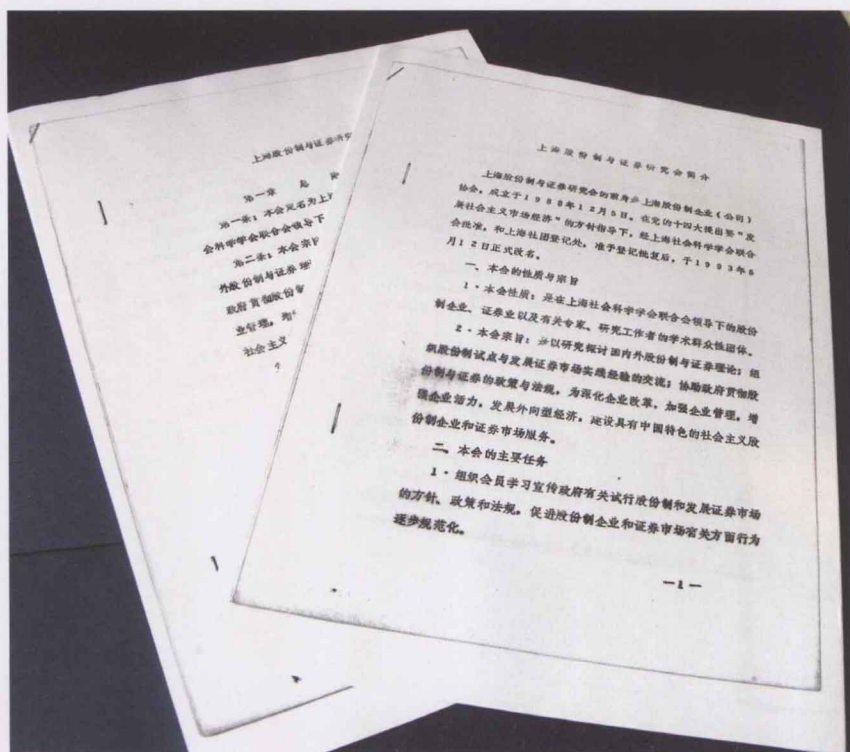
1984年，新中国第一只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面世，其后，因缘际会，这只俗称“小飞乐”的股票见证了太多的第一：第一张被外国人拥有的股票、上海第一批柜台交易的股票、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批上市流通的股票。“小飞乐”后来的壮大过程与中国股市的发展同步。1984年首发“小飞乐”时，总股本仅1万股，每股面值50元，共筹集50万元。2008年，总股本已达到5.599亿股（每股面值1元）。24年间，总股本翻了1000多倍。

中国的股票市场也因之起“飞”，截至2008年10月28日，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股票达到了1581只。

2009年6月，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见证：上海金融改革30年》一书中记录的“小飞乐”往事



1986年6月，上海股份制企业（公司）协会成立后首次股份制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与会的夏禹龙（前排左四）、朱瑶翠（前排左三）与上海、安徽、浙江、江苏代表合影



1993年5月12日，上海股份制企业（公司）协会正式改名为上海股份制与证券研究会



2001年底，经济学家吴敬琏（右四）、时任上海市重组办公室主任范永进（右三）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回顾股份制改革在我国从理论探索到正式写入党的文献而成为改革实践重要指导思想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股份制改革在我国可谓“一波三折”。

据统计，1979年全国返城知青多达1700万，再加上320万没有就业的留城青年，总数达到2000多万。1980年初，为解决就业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时为北京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的厉以宁提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来筹资，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这是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但是，他的这个提议当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几个月之后，也就是1980年8月，中共中央专门又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提股份制的不仅有厉以宁，还有于光远、董大林、冯兰瑞、傅一王、汪钰、赵履宽、鲍恩荣、胡志仁等等，他们都认为股份制是解决就业的好办法。此后，股份制便成为理论界探讨的一大热点。

厉以宁积极主张以股份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他明确指出，股份制本身没有什么社会性质，其性质取决于投资者的性质。二者的关系如同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一样，股份制是一种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企业组织形式，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社会主义实行股份制并不意味着改变企业的公有制性质，而是以新型的公有制代替传统的公有制。1986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思想》一文，从理论上详细地讨论了我国改革以后的所有制体系以及股份公司的构造。此后，他在一系列著述中不断地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从而有了“厉股份”的称号。

但是，厉以宁这些关于股份制改革的主张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争议，正如后来技术人在回忆中所说“压力很大”，“总从来说反面的多，赞成的少”。

社会上甚至有人给厉以宁扣上了一顶搞私有化的帽子，称“厉股份”实际上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当时，股份制的争论也引起了党内的关注。1987年2月，时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薄一波同志接到三份香港《明报》的复印件：一份是1986年12月24日的报道，题目是《北大经济学院教授厉以宁称中国企业股份化改革分三阶段进行》；一份是《明报》12月27日采访厉教授的报道，题目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将全面摆脱贫穷模式》；另一份也是《明报》记者采访厉以宁的报道，题目是《曾是苏联模式改良派支持者厉以宁主张“还权”非“放权”》。

这三份材料上，都有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一位老同志的批语。对第一份材料，老同志的批语是：“请看厉教授怎样完成中国所有制的改革，中国企业股份化，是

山芋”。如果处理不慎，正常的理论探讨很可能会被“大批判”扼杀。

苏星是一位十分注重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的经济学家。他接到薄一波和邓力群的批示后，花了十多天时间仔细研究了香港《明报》有关厉以宁教授讲话的报道及其在国内报刊上发表的几篇主要文章，经过反复考虑，根据自己的看法，给薄一波写了一份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苏星将厉以宁关于股份制的主要观点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所有制改革，而不是价格改革。其二，原有企业资金存量股份化以后，国家可以根据地区和行业的不同，根据企业性质和规模的不同，确定国家所掌握的股份在全部股份资金中的比例（例如钢铁工业可定为40%，纺织工业30%，食品工业20%等），然后国家再根据这一比例，保留企业股份，

而把多余股份分期分批出售；或者公开出售，卖给个人，或者转让给企业，由企业付现金或计息的国家债券偿还债务。其三，减少政府股份不等于搞私有制。

苏星的这些观点，实际上是表达了他不同意某老同志对厉以宁的批评的看法。他的这个报告送上去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动静。直到1988年他被调到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后才了解到，那位老同志看了给薄一波的报告，也接受了他的看法。可以说，正是苏星的这个报告，阻止了一场“厉股份”的“大批判”。（李心草摘自《上海党史与党建》9月号 作者 李庆英）

存捐互利
两全其美

推广数字证书
打造信用浙江

20年前一场关于股份制的激烈论争

教授搞中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办法”。对第二份材料，老同志的批语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将全面摆脱贫穷模式，即完全摆脱贫穷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厉以宁教授的这一套把戏，与方之的‘全盘西化’是一个东西。不过方教授是搞白脸的，厉教授是唱红脸的。厉教授也搞中国要‘现代化’，但他的‘现代化’是‘全盘西化’或‘资本主义化’”。对第三份材料，老同志的批语是：“何谓新型的公有制？扯开面纱，就是不折不扣的百分之百的私有制。还权即把权还给私人，改制，即把公有制改为私有制。”

1987年2月27日，薄一波把这三份材料批给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批示说：“力群同志，这三份材料因字小不能看。请你是否批一人看。”3月3日，邓力群把材料批给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经济组组长的苏星同志，让他研究后向薄老写一报告。苏星接到邓力群批转的任务后，深感这是一个使手的

2008年9月19日，《报刊文摘》刊登的一篇关于20世纪80年代股份制争论的文章



1993年6月23日，中国企业股份制改组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合影



2011年1月22日，林炳秋（上海市社联原常务副主席），曹建华（上海家帝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裁），杜平（国家发改委培训中心主任）参加研讨会



“消费养老”模式研讨会暨“消费养老”模式课题启动仪式



上海市城镇工业合作联社党委书记兼副主任陈兆忠在作改革发展动员报告



上海市城镇工业合作联社主任丁明昌在作技术创新报告



《经济体制改革和股份制实践》一书编委会人员审定书稿



《经济体制改革和股份制实践》一书编委会部分人员合影。前排左起：张明，朱瑶翠，范永进，郑俊镗；后排左起：胡思源，郑伟刚，项达明，曹俊，刘小坤，何单，沈霞

《经济体制改革和股份制实践》编委会

顾问	厉无畏	厉以宁	夏禹龙	林炳秋	王开国
主编	范永进	朱瑶翠	曹俊		
副主编	郑俊镗	郑伟刚			
编委	范永进	杨公朴	顾培柱	秦其斌	贺德川
	朱瑶翠	曹俊	郑俊镗	郑伟刚	刘小坤
	汪异明	许东铭	胡之奎	李力	梅方盘
参编人员	唐齐千	糜靖亚	项达明	俞中兵	迟海燕
	何单	沈霞	肖树森	丁凌	钟元
	魏华文	王蕾	胡思源		

序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也揭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迄今已30余年。在这30余年中，作为每一个平凡的中国人，我们都亲身经历和共同见证了国家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以及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极大提高和进步。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先后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为世界所瞩目。应该说，这一切成就的取得，都是与党和国家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全面推进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密不可分的。

股份制曾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新事物。过去一段岁月，股份制的发展一波数折，但在改革开放中，由于人们思想不断解放，认识不断深化，并坚持反复实践，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股份制”应运而生，进而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织形式，推动了中国经济飞跃发展。

为了忠实、客观、准确地记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股份制产生发展的这段历史，我们结合自己在经济战线多年工作的实践、思考和体会，编纂了这本《经济体制改革和股份制实践》，以期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份基础性史料，为社会呈现一份文献性典籍。

全书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溯源开始，将经典文献回顾与重要史实资料集成，融政策演进突破与实践探索创新于一体，遵循理论指导—政策引导—科学实践—总结完善—创新提高的脉络，既有知名专家学者的理论阐述，又有广大基层单位的实践案例。全书分三篇共十一章，在《综合篇》中，从理论溯源、政策演进、历史回顾三个方面，全面总结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股份制产生发展的历程，阐明了中国只有进行改革才有出路，只有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强国富民的深刻道理。在《实践篇》